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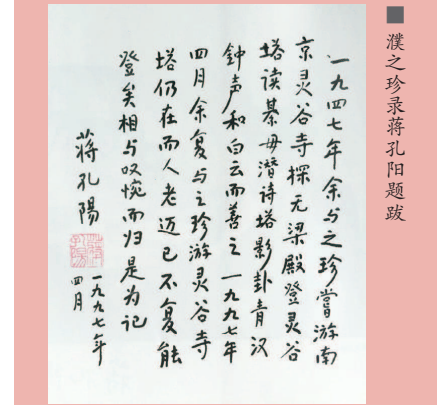
1

师长熏沐

语言文字学是一门带有“理科”色彩的人文学科,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研究语言文字,尤其是古代语言学的女性学者、教授是屈指可数的,濮先生就是这少数中的一位。濮先生性格的养成与成就的获得,与亲人、师长的影响息息相关。五四运动兴起之时,濮先生出生在安徽芜湖的一个普通商人家庭,祖父经商。父亲曾在安徽公学等学习,后因祖父和母亲先后去世,居家教子并经营祖业。她的外公是清末的秀才,父亲、三个哥哥又都是读书人,家里的读书氛围很浓厚。濮先生与几位兄长都是在外祖父的教导下开蒙识字。由于家里读书人多,受到新文化思想的影响,濮先生从小就接受现代学校教育。有趣的是,她初小毕业时考了第一名,外祖父特别高兴,延续前清的“故事”,忙问道:“有喜报来吗?”她顺利地在安徽读完了小学、初中,就当初中即将毕业时,1937年,日军侵华逼近芜湖,迫使濮先生全家逃亡内迁。定居四川万县后,进入长兄所在的金陵中学读高中。而战争摧毁了小康之家,曾经雅爱山水的父亲在忧愤中病逝。濮先生5岁丧母,15岁丧父,在颠沛流离中塑造了坚韧的性格。此后全家由大哥照顾,正所谓“长兄如父”,晚年的濮先生常常想念大哥。

1941年,濮先生考取了新办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中文系,中学任教两年后,于1948年又考取了中央大学中文研究所的研究生。这十年中,她遇到了几位恩师,本科导师魏建功、研究生导师胡小石和十分赏识她的台静农、吴白匋几位先生。他们对于濮先生走上学术道路、在语言学领域取得重要成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濮先生常说自己一路幸运,遇到几位恩师,也很有缘,与这些老辈特别投缘。魏建功先生是章黄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,据濮先生说,魏先生为人如治学,一丝不苟、不苟言笑,他的音韵学、训诂学课程以枯燥而闻名。她却反生好奇,偏偏去听课,并不觉得乏味,进而产生了请魏先生指导毕业论文的愿望。濮先生毕业那年,在桐油灯下,用土纸做卡片,将《方言》与《尔雅》做细致的比较研究,竟完成了5万字的《扬雄〈方

著名语言学家、复旦中文系教授濮之珍先生是百岁人瑞,她以坚韧宽博的性格见证了百年的历史。过了农历新年,先生就百龄晋一了。濮先生的百年历程,可谓学术与家庭两全其美,而其间经历了不少曲折与艰辛,也有美好的回忆。



言》研究》。魏先生给予了“甲等90分”的好评,并作了亲笔评语。后来,魏先生担心战事的不测,将论文原稿委托台静农先生寄给濮先生保管。濮先生精心护持,保存至今,并不轻易示人,据说魏老百岁生日时,北大希望濮先生捐赠此卷,她没舍得。关于魏老的不苟言笑,濮先生说他有个习惯,登门交作业,就开一个门缝,并不接谈,转身就关门。

濮先生的研究生导师是博学的胡小石先生。濮先生不说,我们很难想到她的研究生课题是关于唐诗的研究,可惜的是,这项研究的稿子没有留下来。胡老的性格与魏老迥异,颇有文士的豪兴与洒脱。魏老教课,是先自己讲,再老师学生各半,最后不讲放手给学生,教学方法很科学。而胡老的教学法比较特别,带着濮先生等门生泛舟玄武湖,在湖光山色间畅谈文史。由于这样的“发散式”教学法,使濮先生的学术视野大为开阔。濮先生至今未能专门撰写一篇回忆胡老的文字,正因为感情很深而难以言表。胡老的书法苍劲俊逸,当时就很知名,平时作书十分勤勉。濮先生常为其磨墨、引纸,她强调不是一点墨,是一大缸。她在治学之余,喜爱书法,受胡先生影响很大。实际上,濮先生的几位先生,

濮之珍

两全其美,心宽人寿

潘佳



都具有传统学者、文人的素养,治学之外,书法各具特色。濮先生专学钟繇,只写楷书。钟爱高古质朴的书风,也正透露出濮先生宽博端正的性格。

此外,台静农先生也是濮先生的恩师,他朴实宽厚的态度和爽朗坦诚的笑声,始终令濮先生难忘。台先生业余也爱书画,当年濮先生毕业前后,就为她刻了两枚印章,还送她一幅《乞巧图》。上世纪80年代末,两岸互通,台先生寄给老学生——濮先生一副对联“西风白发三千丈,故国青山一万重”,“老师思念祖国,我也想念老师啊!”濮先生的第一份工作,就是台先生介绍的——重庆清华中学教师。

2

独立思考

濮先生从本科起,就开始了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的研究,贯穿了整个学术生命。她经过三十余年的积累,完成了《中国语言学史》一书,“对中国古代语言学的特征、语言学遗产、中国古代语言学领域各发展时期进行了重新考察,从语言理论的高度论证了中国具有语言学研究历史长达两千多年”。该书是高校语言学的指定教材,四十年来不断重印,近年还出了新版。她又为古代语言文字学家“不平”,下决心将他们从《儒林传》中独立出来立传,进一步扩大视野,主编了《中国语言学家评传》一书。同时,濮先生十分重视语言学理论的研究,早在上世纪50年代,就撰写了《语言》一书。

中国古代有没有语言文字学?这个命题今天可能已无人关心,而在上世纪50年代,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。从历史的演变来看,中国

古代语言文字学发源于传统“小学”。由此,有学者认为,由于“小学”是经学的附庸,古代的语言文字学不具备独立性,只是一种“语文学”。持有该观点的,以王力先生为代表,他在《中国语言学史》中明确提出了这个论断。而濮先生认为不妥,撰写了《书王力先生〈中国语言学史〉后》一文进行商榷,在《中国语文》上发表,阐明了中国的语言学兴起、建立于汉代,我国语言学有着悠久历史、辉煌成绩这一观点。王先生读后,到上海开会时遇见濮先生,他颇为惊讶地说,原以为作者是一位老先生,没想到是一位青年女教师,可敬!虽然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,但也认为她的论文很有道理。作为青年教师的濮先生敢于向老前辈直接表达不同的学术意见,濮先生的独立思考,与王先生的谨慎雅量相映成趣。

3

相濡以沫

濮先生与蒋孔阳先生作为中文系的学术伉俪,是学界的佳话。濮先生与蒋先生感情极深,晚年的她在言谈中常常流露出对蒋先生的思念。她家的客厅五斗橱上常年供奉着蒋先生的照片,濮先生每天要上香。餐桌上摆放着一张他们一起读书的旧照。原先蒋先生的卧室至今按照当时的布置,连那张可升降的床也一直在那里,后来就成为了濮先生的书房。那里正南朝向,对年老的濮先生而言既便于读书写作,也利于身体的保养,更重要的是她始终觉得与老伴在一起。

照,濮先生自然领会了这份心意。1948年末,两位“学术青年”在蒋先生供职的上海海光图书馆举办了婚礼。此后半个世纪风雨相随,两位先生感情至深。蒋先生晚年因帕金森症不便作书,大部分题字都是濮先生代笔。1997年,两位老人故地重游,蒋先生写了一段题跋,言简而意永,濮先生手录,特移录于此:一九四七年,余与之珍游南京灵谷寺、探无梁殿、登灵谷塔。读蔡母潜诗:“塔影卦青沈,钟声和白云”而善之。一九九七年四月,余复与之珍游灵谷寺,塔仍在而人老迈,已不复能登矣,相与叹惋而归。是为记。

年高德劭的濮先生意志坚强、生活独立,80岁以后,完成了蒋先生的著作编辑等一系列工作。濮先生直到百岁,都坚持独立生活,每天读书、看报,2017年亲手完成了自己论文集和年谱简编的编订,这份年谱简编,确实很简,但先生先后修改了六稿,可见其严谨。2016年,濮先生应《光明日报》语言文字版之邀,发表了《中国古代语言学有自己的发展道路》,体现了老辈学者对祖国学术传统的历史责任感。

我作为小辈,与先生相差60岁,自然无缘修读先生的课程。由于奇妙的因缘,多年来常常面聆教诲,十多年前,学校语委命我作为主编,负责《雅言》的编务工作。濮先生是顾问之一,于是便有了登门请益的机会。先生那时已80多岁,但精神健朗,对我们十分关爱,不厌其烦地解答问题。慢慢地,听先生谈抗战求学、治学方法、与蒋先生的美好回忆,后来蒙先生信任,协助编订论文集和年谱简编。不知不觉,十多年就过去了,老先生白发苍苍,我也不再是“小朋友”。

九十岁之后,每有人问濮先生长寿的秘诀,她总是顿一顿,莞尔一笑道“可能我受外婆影响,心比较宽,睡觉特别好,她活了一百岁,我也可能活一百岁”。现在我们祈望先生茶寿之岁,谨撰小文,为先生祝嘏。

■濮之珍与蒋孔阳共同切磋,教学相长